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

主编 曾宪林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孙莹 丁惠希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曾宪林主编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孙莹 丁惠希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孙莹,丁惠希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3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曾宪林主编)

ISBN 7-307-02261-3

I. 大…

II. ①孙… ②丁…

III. ①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1924~1927

②外交史—中国—1924~1927

IV. D829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毕昇印刷总厂印刷

(436700 湖北省英山县温泉镇鸡鸣路 60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19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2261-3/D·321 定价: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印刷厂调换

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前言

曾 宪 林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的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部分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的革命运动。当时，国共两党和广大群众，都把这一革命称之为国民革命。但1927年国民革命从胜利转向失败以后，这个革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国民的构成也有很大的不同，革命的人民及广大群众，在为挽救革命失败而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为弘扬革命正气，把国民革命改称为大革命。从那以后这个中国大革命的称谓一直沿用到现在，并已成为人们用来称呼这一时期革命的习惯用语和专有名词。过去60多年来，大革命这个称谓虽不尽科学和确切，但考虑到人们的习惯，我们这套丛书仍用这个称呼，命名为《中国大革命史丛书》。

中国大革命运动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许多国际、国内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很早就开始关注、研究、描写这段历史有关问题。回顾过去近70年来，国内对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在延续不断地进行着，大致走过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从大革命时期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约26年左右为研究的起步阶段。在这期间，从大革命时开始，除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斯大林等，在许多政治报告、讲话和著述中，论述了中国大革命有关问题以外，我国不少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对这段重要历史进行了述论：1926年蔡和森在共产国际会议上所作的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提纲）》，就用较大的篇幅谈到大革命历史；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蔡和森又在《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文论中，深刻总结了大革命斗争中的教训；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更是认真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这前后，瞿秋白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报告中，论述了大革命斗争历史。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李立三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个历史时期的许多论著、报告、讲话中，阐述了大革命运动的意义、经验和教训。所有这些，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革命斗争发挥了指导作用。此外，在中国大革命研究发展史上，开中国大革命史系统研究之先河的，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华岗，他于1929年撰写了《中国大革命史 1925—1927》一书，后来这部学术著作于1931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大革命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及群众革命运动等作了详尽的论述和分析，歌颂了新民主主义的第一次大革命运动。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历史条件的局限，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及当时犯有“左”倾错误的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未能采取分析的态度。但我们不能苛求前辈，应该说这部书仍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在当时，它为第一次大革命中流血牺牲的成千上万的英勇战士，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从那以后的革命战争年代流传甚广，影响和激励过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也为后来研究中国大革命史的历史工作者留下了一部重要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后期，将近30年时间，为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和遭到破坏的阶段。这段的前期，即“文化大革命”前，是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时期，当时，最先是叶蠡生、罗仰申发表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简史》；后来从1956年起，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魏宏运，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上10篇有关武汉国民政府的专题文章；接着湖北党史、革命史学界，在1958年党史调查基础上，由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哲学社会科

学研究所历史研究组的同志们，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撰写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革命史资料》（近30万字），其中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和湖北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的斗争历史，及武汉国民政府的革命活动和它后来的变质。它虽因各种缘故没有公开出版，但它作为内部书稿发至武汉各大专院校，丰富和推动了大革命历史的教学，并为后来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在武汉仍在深入，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的科研人员，还编写出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北革命斗争大事记》、《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资料》（草稿），并在《江汉学报》、《历史教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了有关研究中国大革命史方面的专题论文。这段时间，一是资料上有突破，并进行了整理；二是有系统的著述，并发表了一些专题文章，比建国前的研究前进了一大步，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时间里，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事业遭到了破坏，不仅历史被篡改和歪曲了，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在这段时期资料散失了，人员分散了，机构也被撤销了，研究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3年的近14年时间里，是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兴旺时期。这一阶段，由于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双百”方针，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空前繁荣并成为热门课题。据不完全统计，10多年来先后发表了近1000篇论文及大批学术著作、回忆录，大批专题学术资料也相继问世。其中著述较为集中的地区有北京、上海、湖北、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吉林等省市，尤为突出的要算是湖北和北京。这些年来，湖北和武汉的中国革命史、现代史学界除王宗华、郭步云、曾宪林等，参加和主编中南三省协作编撰的《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这一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以外，还陆续出版了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史》，张光宇著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革命军》，曾宪

林、谭克绳、曾成贵、江峡、徐凯希等合作主编和合著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运动史》、《北伐战争史》、《中国大革命史论》、《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此外，曾宪林等和武汉市党史办还编辑和出版了《汉口、九江收回英租界斗争资料选编》、《邓演达历史资料》、《五卅运动在武汉》等专题学术资料。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达 400 多篇。在对大革命史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论述和评价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讨论也十分热烈，无论在研究的广度、深度，或发表著述之多，学术空气的浓厚等都是空前的：诸如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评价，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战略策略，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问题，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性质，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斗争领导权问题，武汉国民政府继续北伐，迎汪复职问题，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评价问题，郑州会议与徐州会议问题，农民运动问题，共产国际与大革命问题，以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瞿秋白、邓演达、蒋介石、冯玉祥等人物活动的评价和分析，都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从而把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在此基础上，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联络武汉、广州、上海有关专家、学者，于 1991 年 10 月，成立了以曾宪林为主任，何定华、周景堂、王宗华、郭步云等领导和教授为顾问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作为深化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专门学术机构。

上述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虽然在前进中有过曲折，但总的来说成绩是巨大的，在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和作用。然而，对它研究的时间还不长，应该说这些学术问题的探讨仍是初步的，且还有许多新的问题有待深入，领域也需要拓宽，特别还有不少薄弱环节尚待加强研究，因此可以说这方面的科研工作还任重道远。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心成立到现在，已经接近 3 年的时间了。这段时间里，我们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

在扎扎实实地工作着，今后当加倍努力，力争全方位地深化中国大革命的研究，培养更多的研究人才，把中心办出成效，办出特点。目前要上的课题不少，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从去年开始起步编撰一套《中国大革命史丛书》（共10部，每部20万字左右）。这是学术性质的著述，是在原来研究基础上，对大革命时期的政权、政党、思潮、文化、教育、经济、工人运动、青妇运动、对外关系等方面分别进行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这是意欲推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中国大革命史，是中国革命历史链条的重要一环。它的研究能否深化下去，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而特别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及对当代中国革命历史研究关系极大。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更深层次地研究中国大革命斗争历史，弄清大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斗争，阐明新民主主义第一次大革命运动的历史背景，搞清楚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及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局，认识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世界和中国革命形势与中国大革命的关系，全面考察中国大革命历史的兴起、特点、发展及其胜利和失败，认真地深刻地总结中国大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阐明这些经验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作用等，有着特殊的意义。形势的发展，需要把这段历史的研究推向新阶段。

这套丛书就是适应这样的客观要求，按照这些年来深化大革命史研究中提出来的新课题，从更宽的视野，更高的高度，去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的方方面面。一般说来，曲高必然和寡，是学术专著就不容易普及，这就是说，阳春白雪要耐得住寂寞，既是学术论著就较难畅销。我没有过高的奢望，只要求丛书的出版能科学地从各个不同角度的专题著述中，阐明中国大革命为什么一定要打倒列强除军阀；为什么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一定要建立统一战线；为什么没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努力就没有中国大革命；为什么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群众对大革命的参与，能使大

革命运动具有轰轰烈烈特点；以及如何正确地评价这一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大革命精神。总之，丛书的出版，能够较好地起到激励人们投入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及加强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作用，或起到历史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有助于提高人民的觉悟，去寻找和理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就非常满足了。当然，我们也祈望丛书的出版，能在国内国际研究中国大革命史（即中国国民革命史）方面，起到交流作用。

上述这些要求不是轻而易举能够达到的。为此，我们研究每一个课题，都必须经过严肃认真的探讨、思考；每一部著作都要下苦功夫，认真钻研，才能成功。无疑这是创造性的劳动，是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结合，是心血的结晶。

史学的基础在于史实，大革命史的研究更应该是这样。因此，丛书的撰写必须从占有资料入手，但又不能止于资料。占有史料，搞清史实是研究与撰写大革命史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除此以外，还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要有哲学的思辨，要经过扎实的研究。这就要求所有参加撰稿和创作的科研人员，既要加强理论素养，又要在业务上有过硬本领，而且还要吃苦耐劳。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要甘于寂寞，要从热闹场中跳出来，走进资料室、图书馆、档案馆默默去耕耘；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时代高峰，去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这样才能提高丛书的质量，拿出高档次的科研成果献给人民，献给历史研究事业。

1994年2月下旬于武汉东湖之滨

目 录

第一章 华盛顿体系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	1
第一节 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	1
一、重定列强各国在华“均势”的华盛顿会议及北京政府“协调各国关系”的外交政策·····	1
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的兴起及北京政府的对外交涉·····	20
第二节 中俄邦交新变化·····	35
一、苏俄三次对华宣言及外交活动·····	35
二、中苏会谈·····	41
三、《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	45
第二章 北京政府后期的对外关系·····	54
第一节 五卅惨案及北京政府的对外交涉·····	54
一、五卅惨案·····	54
二、北京政府关于五卅惨案的对外交涉·····	60
第二节 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	68
一、“修约”外交的出台·····	68
二、关税会议·····	77
三、法权调查·····	86
四、收回上海会审公廨·····	90
五、征收海关附加税与罢免安格联·····	95
第三节 日本侵夺东北、内蒙的阴谋活动及北京政府的垮台·····	102
一、日本侵夺东北、内蒙的阴谋活动·····	102
二、反苏逐步升级·····	111

三、皇姑屯事件及北京政府的结束·····	114
第三章 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关系·····	125
第一节 广州革命政府“反帝联俄”外交政策的确立·····	125
一、孙中山“反帝联俄”外交思想的形成·····	125
二、国民党改组后的外交政纲和外交策略·····	136
第二节 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关系·····	145
一、广州革命政府“联俄”政策的初步实施·····	145
二、关余问题的交涉·····	152
三、平息商团叛乱·····	162
四、孙中山至死不渝地坚持“反帝联俄”的外交 政策·····	172
第三节 广州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181
一、沙基惨案的交涉·····	181
二、杯葛事件的交涉·····	188
三、坚持“废约”，反对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	196
四、苏联顾问襄助决策北伐·····	201
第四章 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	208
第一节 国民政府力挫列强的两手策略·····	208
一、国民政府粉碎列强共同武力干涉的阴谋·····	208
二、国民政府揭示英国对华“新政策”的真实意图·····	214
第二节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外交斗争·····	223
一、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接管·····	223
二、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	230
第三节 南京惨案的交涉和“退却外交”的实施·····	240
一、南京惨案的交涉·····	240
二、列强与四·一二政变·····	247
三、四·三惨案和“退却外交”的实施·····	253
参考书目举要·····	260
后记·····	262

第一章 华盛顿体系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

第一节 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

一、重定列强各国在华“均势”的华盛顿会议及北京政府“协调各国关系”的外交政策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统的军阀分裂成许多派系，但由于北京政府已作为中国国家主权和人民瞩望统一的象征，各派军阀又都在不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们便争相控制北京政府，以便号令其他军阀。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继承了北洋系统的主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先窃据北京中央政府。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段祺瑞攫取了很多在华权利，大有独霸中国的趋势。这必然加剧美英与日本的矛盾。虽然日美签订了“兰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维护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及对工商业机会均等之主义”，使日美矛盾暂时缓和，但美英不能容忍日本妄图独霸中国的野心。受美英操纵的曹锟、吴佩孚同样对皖系把持的北京政权和军权，也伺机夺取。1920年7月10日，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直系在奉军的援助下打败皖系，从此直奉军阀开始操纵北京政府。皖系在战争中的失败和直系的胜利，是美英在中国的势力占了上风和日本的势力受到挫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日本势力的完全失败。早在

皖系势力遭到中国人民唾弃的时候，日本已经物色到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做它下一步较量的新工具。直、奉共同把持北京政府的事实，说明美、日成了北京政府的共同主子。而两个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在广泛的范围内开始一场新的角逐。

近代中国是各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焦点。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如法国称霸欧洲大陆，英国巩固在中东、地中海的优势，保持海上霸主地位，为日本巩固在中国和南太平洋的势力奠定了基础，这使美国统治集团大失所望。恼火至极的美国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政府也没有参加由它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这说明凡尔赛体系只是暂时调整了帝国主义在西方的矛盾。而它们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趋激烈，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首先，在太平洋和亚洲地区，美国、英国与日本的矛盾与日俱增。日本战后仍踞独霸中国的优越地位。经济上，1919年日本对华投资达到14.39亿日元，比战前增长近2倍。对华贸易总额为11.42亿日元，较战前增长2.6倍。这些都优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政治、军事上，除继续占领山东以外，在入侵西伯利亚的同时，其军事力量已扩及北满地区。日本野心勃勃，鼓吹“东方门罗主义”，妄图独占中国。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一跃而成为世界头号债权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财政势力中心，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①，战后急欲重返远东，以恢复和扩大在华权益。在美国看来，日本独霸中国的目标不仅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在华权益，而且最终会把美国赶出亚洲大陆和西太平洋。日本的图谋也威胁着英国在亚洲的利益。1920年，英国通知日本，它将不以当时的形式续订“英日同盟”条约。这种情况表明英美可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日本。

^①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1页。

其次，列强之间海军军备竞赛日益激烈。20 年代海军作为一种战略威慑力量是国家强盛的标志。日本为了称霸东亚，积极扩军备战，仅 1921 年年度海军支出达 7.6 亿日元，占日本每年支出总额的 48.7%。为了减轻这个沉重的负担，日本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尤为必要。美国在世界大战一结束就提出了新的造舰计划，虽然美国以赶超英国为目标，但却是以日本作为主要作战对象的。美国不断扩大太平洋舰队，并在关岛、菲律宾和夏威夷设防。海军部长丹耐尔斯制定了扩充海军计划，一举建造主力舰 16 艘，以便使自己的海军力量赶上英国。英国对美国的挑战极为恐慌，但又苦于战后债台高筑，于 1920 年 4 月向美国表示，英国愿与美国保持同等数量的海军。美国新任总统哈定眼见海军力量赶上英国有了可能，但又迫于国内要求国际裁军和平运动的压力，下决心召开限制军备竞赛的国际会议，以求遏制日本。

第三，拆散“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最早成立于 1902 年 1 月，同年 8 月又第二次结盟，这两次结盟都是为了相互利用以对抗俄国。1911 年 7 月 13 日，第三次结盟，这次除对付俄国以外，还加上对付德国。英日结盟，英国原想利用日本充当英国在远东利益的警犬，不料日本反利用同盟来扩大自己在远东的侵略，“英日同盟”成了日本恃以进行大陆扩张的国际支柱。1921 年即将期满的“英日同盟”等待续约。美国认为要限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就要拆散“英日同盟”。美国指责这个同盟袒护了日本对中国的蚕食。日本竭尽全力保护这个同盟。1921 年 3 月派皇太子裕仁访英，争取英日续约，目的是为了对付美国以保其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英国考虑到德国新败，沙俄消亡，继续保持“英日同盟”没有多大必要，加之美国的反对，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决定把这一有争议的问题搁置起来，以待日后解决。

第四，俄国十月革命后，迅速建立起稳固的社会主义新政权，并成立第三国际，开展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已蓬勃发展，这使列强各国大为恐

慌，协调各国间的对华政策，抵消苏俄影响，扑灭中国革命火焰，成为列强的当务之急。

英美两国就解决上述问题反复进行磋商，由美国总统哈定于1920年7月1日，以维护和平缩减军备为名，非正式提出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其目的在于解决限制军备问题和废除“英日同盟”，并使列强承认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重定各国在华“均势”。这既可遏制日本，又将为美国向中国经济扩张进而争夺远东霸权带来好处。

日本统治集团对美国倡议深感不安，担心列强对日本实行“总清算”。内阁会议权衡后，7月22日决定，日本参加军备会议，并且采取积极的方针，利用一切机会致力于消除各国对日本的误解和反感。8月，当接到美国的正式邀请后，与美国讨价还价，要美国保证不将山东问题和“二十一条”列入议程，同时还要美国承认其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方允参加会议。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苏维埃俄国和远东共和国被拒于会议之外，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代表伍朝枢因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没有赴会。北京政府对华盛顿会议抱有极大希望。1921年8月16日，北京政府接到美国正式邀请后，复照美国政府表示“深愿与各国一律平等参预，共襄盛举”。对于美国总统哈定关于召开华盛顿会议声明中指出的“涉及太平洋与远东之讨论，不欲设法划定范围”，更是表示“赞同”。^①中国派出了阵容庞大的代表团，首席代表为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顾维钧，司法总长、大理院院长王宠惠为全权代表，另有各派团公推的“民众代表”余日章、蒋梦麟，还任命曾经任财政总长、代外交总长、代陆军总长及国务总理的周自齐，曾经任外交总长的梁如浩以及海军中将蔡廷干

^①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301—302页。

为高级顾问，加上随员多达 132 人。中国全权代表的分工为：施肇基负责撤军、撤销和移交外国邮局问题；王宠惠负责收回外国租界、废除领事裁判权、取消“二十一条”问题；顾维钧负责租借地问题、势力范围问题、关税问题、山东问题，以及修改不平等条约问题。^① 美国代表为国务卿休斯、前国务卿罗脱等；英国代表为枢密院长白尔福、海军大臣李义及澳、加、印殖民官员；法国代表为总理白理安等；日本代表为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贵族院长德川家达、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等；出席会议的还有意、比、荷、葡等国的代表。会议设立两个总委员会，一个是限制军备问题委员会，由美、英、法、日、意五国组成；一个是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由出席会议的九国组成。总委员会还下设若干小委员会讨论具体问题。操纵会议的是美、英、日三国，主要是美国。美国政府宣布会议要领三端：（1）各国对于太平洋及远东之主义及政策，须先决定一般的原则；（2）特定国间之问题，如有抵触前项一般原则之适用者，得交会议讨论；（3）凡关系参加会议列强全体之国际问题须全部付议。^②

限制军备会议一开始，美国就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美国首席代表休斯在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限制海军军备的具体方案。他指出，各国应停止建造主力舰 10 年，削减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主力舰 200 万吨。在此基础上，按照 5 : 5 : 3 的比例规定美、英、日三国主力舰的最高吨位限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英、日两国接受了休斯的建议，而法国和意大利无可奈何，也不得不接受造舰 1.75 的比例。此外，美、英、日三国还保证不在各自太平洋属地加强设防。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日、意、法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日本虽然被迫承认了其海军的较弱地位，

^①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18—219 页。

^② 刘彦：《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下），上海太平洋书店 1928 年版，第 301 页。

但由于它的舰队只在太平洋上活动，因而在太平洋上它实际上处于相对的优势。

在遏制日本海军发展的同时，美国着力要拆散它猜忌已久的“英日同盟”。英国考虑到自己在东亚的广泛利益，希望用英、美、日三国同盟代替英日同盟，但美国拒绝这一建议，转而主张将同盟改为互不侵犯公约，并邀请法国参加。12月13日，美、英、日、法代表在《四国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之条约》上签字。第四条明确规定：条约生效后，1911年“英日同盟”条约应即作废。美国巩固和发展远东权益的心腹之患，随着“英日同盟”的解体而消除。

远东与太平洋问题的中心是中国问题。会议在解决海军军备问题后，就美国而言，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在中国确立“门户开放主义”来进一步摧垮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会议，就中国问题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形成了华盛顿体系，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九国公约》、《关于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决议案》、《中日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

第一类，《九国公约》。北京政府之所以参加华盛顿会议，有自己的希望和目的：（1）是期望列强对于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有所放松。打算在会议上提出关于关税自主、撤废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队、取消各国在华势力范围等问题；（2）拟请会议解决收回山东问题和废除1915年《中日条约》及换文问题这两大悬案。（3）确立各国对华一般原则，防止对于中国主权的任何新的侵蚀。

华盛顿会议根据美国提议首先讨论各国对华一般原则，北京政府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满以为美国会帮助中国。当11月16日太平洋远东委员会审议中国问题时，首席代表施肇基提出了包含美国倡导的“门户开放”在内的“十项原则”，主要内容是：（1）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其政治与行政独立；（2）赞成门户开放与各国工商业机会均等；（3）各国间订结有关中国或太平洋及远